



Dai Kerong

戴克戎 骨科和骨科生物力学专家。1934年6月13日出生，福建省漳州市人。1955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第九人民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关节外科临床医学中心主任。创建了国内医院中最早的骨科生物力学研究机构，将生物力学引入骨科领域。在国际上首先将形状记忆合金制品用于人体内部，发明了一系列形状记忆骨科固定器，并研发了系列化计算机辅助定制型人工关节。近年在骨再生研究方面亦取得系列成果。获国家发明奖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奖二、三等奖，部市级科技进步奖等20余项。2003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选择与舍弃中构筑人生

人们不可能得到他们希望得到的一切，也不可能回避他们不希望面临的一切。于是，人的一生就势必要在无数的选择和放弃中度过。当你面临两个选择时，你得到的和失去的（或者说是错过的）各占一半。当你面临五种或更多的选择时，你得到的是二成或更少，失去的将是八成或更多。有些得与失至关重要，甚至将影响自己的一生。有些比较次要，但也足以决定生命中的一时、一事。众多的得与失累积起来，就组成了人生。

帮助我们作出抉择的，有主观因素，那就是个人的人生哲学和信念；有客观因素，那就是国家、社会、家庭的需求和自身所处的环境；此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你的成熟度——对自身能力和社会发展趋势的判断能力。

信念影响抉择

我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童年阶段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第二次世界大战，随着父母逃难，两次家毁幸而人未亡，小学阶段只有三年在学校中接受教育，其余全靠自学。但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却能以较好成绩先后考入南京金陵大学附中的初中部和上海南洋模范中学的高中部。解放后生活环境渐趋稳定，但在大学毕业前夕，又曾接受安徽省百年未遇的特大水灾救灾医疗队的磨炼。这些经历，使家境虽然较好的我，比起同龄人更吃得起苦，并在我面临人生最大的抉择之一——大学毕业分配时起了巨大的作用。当时我父亲因喉癌手术刚一年，他却放弃了对我选择志愿的任何干涉，使我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第一次完全按照个人的人生理念作出抉择。结果我和两位同班同学贴出了“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的决心书，申请到新疆去。那两位同学分配到内蒙古，我却被分配到首都北京。到北京后我固执己见，坚持要到“艰苦的地方”去。四天后被再分配到当时名震中外、国家重点建设的两条铁路之一——宝成铁路的中段，秦岭南麓凤凰山下的一个叫双石铺的小镇。铁路修通之前，中段当然是最艰苦的，住的是竹条编制的临时房或帐篷，在露天“剧场”看电影和慰问演出，出差或探亲要乘敞篷卡车翻山越岭。但当时我年轻，感到生活得十分充实、愉快。工地医院的主力是抗美援朝部队医院整体转业的，这使我幸运地生活在一个充满激情和朝气的集体之中。第一年我和同事们一起开展了创伤救治、腹部外科，乃至剖腹产、上产钳。第二年开展了脑外伤的开颅手术，第三年开始了胸腔手术。毕业两年后我在

国内高层次的医学期刊中华外科杂志上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有关胸部外伤的论文,随即又在其他杂志发表了有关颅脑外伤的论文。而最艰难的却是撰写一篇文献综述,那时候没有复印机,没有计算机,连续两年我回上海休假的时间大部分耗在上海医学会的图书馆里,连看带抄了一百多篇文献,用两年多的时间完成了一篇有关葡萄球菌感染的综述,再次发表在中华外科杂志上。

1959年宝成铁路全线通车,考虑到我父母的健康情况和身边无人照顾,铁道部决定调我到上海工作,而我却按工地医院的要求随院到了太行山参加另一条铁路建设。不久以后医院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不回上海,改调汉口铁路中心医院和新建的武汉铁道医学院,于是我又到了汉口。两年后经铁道部一再催促,1961年回到上海。回顾我毕业后的前五年,不仅在医疗工作中,也在事业道路上面临着一个又一个选择。反过来看,我也失去了太多机会,例如在首都工作的机会、早日返沪回到父母身边的机会、在大医院中接受正规训练的机会,以及在大城市中较舒适的工作与生活的机会,但这些年的磨炼却使我受益终身。回顾这段历程,权衡得失,如果让我重走一遍人生路,我还是会选择原来走过的道路。当然,我非常对不起我患病的父母,但他们却为我感到骄傲。

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当我40岁人到中年时,会又一次面临事业上的重要抉择。1975年正值“文化大革命”中期全国高校大调整,我所在的上海铁道医学院撤销搬迁,部分人员分散到上海市的三所医学院。我与部分同事到上海第二医学院(以后的上海第二医科大学,现在的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报到。医学院要我们先填报自己的意向。那时我是骨科主治医师,在上海第二医学院的四所附属医院中,瑞金、仁济、新华医院都有骨科而且都有较高知名度,唯独九院没有骨科,只在外科病房中有六张骨科床位,骨科医师只有一位。我毕业后最初五年

的创业经历使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九院。但医学院附属医院终究和工地医院不同,医疗任务和人事关系复杂得多,而且又正值“文化大革命”,我的身份是“黑五类”,这使我选择的道路比起秦岭和太行山,要坎坷得多。从孤身一人(原有的一位骨科医师请了长假)到与一位进修医师轮流值班而形成“骨科小组”,到迁入地下室建立独立的骨科,直到现在成为国家重点学科、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和上海市关节外科临床医学中心;从论文被全国学术会议录取却拿不到出席证,到逐渐被同道和骨科学会接纳,到担任全国和上海骨科学会的副主委和主委,再到担任世界华裔骨科学会和亚太人工关节学会主席。这些进步,得益于我进上海二医时的取与舍,更得益于我们科室的全体成员舍弃条件优越的单位不去,却陆续来到九院小骨科的抉择,我们的团队因此更能团结一致,都认识到团队所创立的每个点滴成绩来之不易,都使我们倍加珍惜。

1955年的选择,决定了我事业旅程的起始点,1975年的选择,成为我在事业上走向成熟的转折。前者含有更多年青人的激情,后者体现了更多成年人的深思熟虑,但二者都基于我个人的人生信念——喜爱比较艰苦、有挑战性的工作,在奋斗中获得人生的乐趣。回想起来,两者都令人心悸,两者都无怨无悔。

需求引导抉择

人生中许多抉择是“由不得自己的”,有人说这“不自由”。但人首先是社会的动物,人不能离开群体。离开群体利益,人不可能有所作为,或者说不可能生存。毕业后在外科工作了若干年,我先后考虑过将选择胸外科、神经外科……作为我的终身专业,唯独没想到骨科。1962年我被派到上海静安区中心医院带上海铁道医学院的学生见习普外科,任务完成后临时又让我留下继续带骨科见习,数月后又派到仁济医院骨科边学习边带学生见习,从此我竟

“自然而然”地成了骨科医师。应该说,不是我选择了骨科,而是骨科选择了我。但很快我就爱上了骨科专业,数年后我已心甘情愿地要为其奋斗终身。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领导选择你、同事选择你、机遇选择你、病人选择你……远远多于你选择他们。既然别人选择了你,就要尝试着让自己也选择对方,试着去适应、热爱、迎合这种被动的选择,变成主动地参与。这样,“自由”并没有被剥夺,而是靠自己的努力获得了又一次“自由”。

学做成熟的抉择者

人们在思想、工作、阅历上有了一定的成与败的积累之后,就变得成熟,开始对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方向有了更清晰的估价,对社会和科学事业的发展趋势有了更清醒的判断能力。这时再面对各种机遇和挑战,将会更加明智、果断地作出抉择。不少的抉择是几小时甚至几分钟之内作出的,但其基础扎实,属于另一种类型的“深思熟虑”。

我曾经看到一篇有关美国阿波罗计划结束后大量科技人员转行发展生物力学的报道,立即进一步了解相关内容,在意识到生物力学的发展将多方面推动骨科的基础研究与临床工作后,决定进入该领域,建立了国内医院中的第一个骨科生物力学研究室,随后又主编了中国唯一的一本生物力学杂志,一干就将近30年。我也曾经与上海钢铁研究所的一位工程师在门诊候诊室作了仅仅10分钟的交谈,引发了持续20多年形状记忆合金医学应用的漫长探索,在国际上首先将形状记忆合金制品用于人体内部,随后又发展了系列产品,曾因此获得国家发明二等奖。我与上海交通大学王成焘教授是在烟台一次学术会议上结识的,返沪后立即开始

了两科互访,经过12年的合作于1998年实现了计算机辅助定制型人工关节的产业化,并共同获得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通过一次近似偶然的电话和随后的一次特邀讲座,我与美国华盛顿大学医院骨科实验室的一位专家有了相互了解,在医院领导的支持下两周内签订了合作意向,随后建立了简陋但高效的骨科基因治疗实验室,安排一位副主任赴美短期工作、学习,随后进行了历时五年的基因治疗促进骨再生的研究并取得初步成果。本世纪初与法国地中海大学和滨海大学几位教授的一次会议接触,引发了持续至今的合作交流,包括派出不同层次的人员进修、合作带研究生、共同承担政府级科学合作项目,直到成立中法生物材料与细胞治疗联合研究中心。我还可以举出更多的例子,来证实只要平时注意知识与信息的积累、养成创新思维的习惯、不放过瞬时即逝的机遇,就完全有可能在数分钟、数小时或数天的时间内,作出影响和主宰随后几年甚至一二十年研究目标的决定,然后依靠团队的共同努力和执著的科学精神,去实现计划、创造成绩。当然,几十年来我也放弃或是错过了更多的机会。上述的一些例子涉及的研究目标似乎比较分散,但全部与关节功能重建或骨再生相关,其他的只能放弃。这种舍弃大部分是正确的,这使我们能集中力量、保持大目标的恒定。但也有许多抉择是错误的,使我们错过了一些可能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这也正是我至今未能取得更大成绩的原因。

回顾、分析和总结人生,从年龄看我是大致够格了,但从素质、悟性、造诣的角度衡量,我还远远没有资格,还欠火候。只能选上几条亲身经历的小故事,记录下来供参考。